

## 第六章 合浦南越国时期的社会风貌

本章主要根据合浦南越国墓葬材料，扼要地讨论当地居民的族属和社会身份、人文民俗与生计方式，以及海外贸易及交通线路等问题。受发掘材料数量限制，本章的讨论仅是提纲挈领，但仍然能够大体反映出南越国时期合浦的社会风貌。

### 一、居民族属和社会身份

通过分析合浦双坟墩 D2 及文昌塔一期墓葬所反映出土的文化因素，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族群主要为本地越人，另还有少量外来越族和汉人。

先秦时期，“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sup>[1]</sup>。可见，岭南七郡包括合浦，直至汉代都是越人的聚居区。在《后汉书》等典籍中，多称越人为“蛮夷”和“乌浒蛮”等，如东汉元初三年（116 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sup>[2]</sup>，“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sup>[3]</sup>。

学术界认为，百越民族可分为吴越、南越、西瓯和骆越等。一般认为今合浦先秦时期属于骆越分布范围<sup>[4]</sup>，但是也有其他意见<sup>[5]</sup>。由于合浦迄今未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存，故其体现的文化面貌尚未可知。合浦文昌塔墓地第一期的 34 座 A 型窄坑土坑墓，形制简单、规模小、随葬器物较少，以陶器为主，主要为瓮、罐、折肩罐、杯、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釜和提筒等，多不见代表汉文化因素的鼎、盒、壶、钫组合，地域特色明显。这类墓葬在平乐银山岭和广州汉墓同期亦有发现，发掘者指出墓主应为当地土著民族<sup>[6]</sup>。

除当地土著民族外，从墓葬材料来看，合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还不断迁入一些外来越族，有迹可循的是南越和吴越。“南越”一名最早见于汉代，主要指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越人集团<sup>[7]</sup>，合浦临近该地区，两地西汉时期都流行几何印纹和刻划纹陶器，纹饰多见方格加各类戳印纹等。合浦常见的瓮罐组合在广州西汉墓中较为普遍，出土的陶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提筒、簋等越式器物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十分相似。从合浦文昌塔第一期墓葬看，西汉早期合浦受南越文化影响较大，出土同类越式器较多；西汉中期起，南越文化因素逐渐减少，三足盒、三足罐和甑多不见，其他越式器物仍有少量。体现出早期合浦与南越中心地区交流密切，不排除墓主有来自南越的可能。

而合浦双坟墩土墩墓则体现出吴越文化因素。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主要分布于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分及皖南部分地区，在合浦为首次发现。合浦土墩墓一墩多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甑、陶杯等均与江浙土墩墓几乎完全相同，推测墓主应为江浙越人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sup>[8]</sup>。其

中，2号墩(D2)年代较早，为秦至西汉早期，形制和出土器物均体现出浓厚的吴越文化特征；1号墩(D1)年代略晚至西汉中期，出土器物及组合较2号墩发生明显变化。除江浙越式器外，还出现本地越式陶瓮和少量陶纺轮、铜斧等汉式器，显示出多元文化的交融。

合浦南越国时期墓葬主要是小型土坑墓，或有少量木椁墓，随葬器物数量不多，种类单一，以陶器为主，但是仍然出有鼎、盆、釜、剑、戈、钺、矛、环首刀、镞、镜、带钩、扁钟、釜、钱币等铜器，剑、刮刀、锛、带钩等铁器，以及玉璧、滑石璧、玻璃串饰和仿蜻蜓眼玻璃珠的陶球等器物。结合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大多是本地越人中的中、下层平民，个别为地位较低的军政人员，如属吏、戍卒等，未见较高等级的官员和地方豪族等上层人物。

## 二、人文民俗与生计方式

百越人群“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sup>[9]</sup>，风俗习尚与中原居民有很大差别。中原人较早时期视岭南为荒蛮之地，在民间充斥着各种奇风异俗，文献中有“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sup>[10]</sup>，“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绁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sup>[11]</sup>，交趾之民“项髻徒跣”<sup>[12]</sup>等记载。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岭南古代居民的饮食习俗尤其特殊，如食槟榔，“自云交州地温，不食此无以祛其瘴疠”<sup>[13]</sup>，“岭南獠民好为蜜啣（蜜汁浸泡的鼠胎）”<sup>[14]</sup>。这些风俗习尚主要是适应地理环境的结果。

早前有学者将越人文化的特异之处概括为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用胶着语）、使舟及水战、善铸青铜器（剑、铎、鼓）等方面<sup>[15]</sup>。其后有学者进一步将百越人群的物质文化归纳为“种植水稻，喜食蛇蛤等水生小动物，发达的葛麻纺织业，大量使用石铤和有段石铤或有肩石器，有极精良的铸剑术、善于用舟和习于水战，营住‘干栏’式房屋，大量烧用几何形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将其精神文化特点归纳为“操着有鲜明特点的语言（胶着语），流行断发文身和拔牙习俗，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群婚，从妻居残余及妇女婚后长住娘家），崇拜鬼神及迷信鸡卜，崖葬（或称悬棺、船棺葬），崇拜蛇、鸟等图腾”等方面<sup>[16]</sup>。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越人居民应该在某些方面具有这些文化特征，不过受考古材料限制，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主要是丧葬习俗。

合浦南越国时期的居民墓葬主要为土坑墓，窄长方形墓坑和设置二层台均是岭南越人的传统葬俗，不过没有见到墓底设置腰坑和铺卵石的情况；部分底部有枕木沟的宽坑墓可能使用木椁，应当是受到汉式丧葬制度的影响；土墩墓则是源自江浙地区越人的葬俗。随葬器物方面，长方形窄坑墓主要随葬罐、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

足盒等越式陶器；宽坑墓同时出有鼎、盒、壶、釜、带钩、铜镜、铁锛等汉式器物，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不完整。越式陶器以硬陶为多，纹饰以方格纹、弦纹、水波纹为主，剑、戈、钺、矛等青铜兵器或许反映了越人“好相攻击”<sup>[17]</sup>的习俗。

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 276 件，为研究合浦南越国时期居民的生计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合浦南越国时期居民的生计方式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包括海洋人文背景在内的社会面貌。

### （一）农业、渔业

合浦地区气候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炎热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县境北部为丘陵，南部为台地和滨海平原，中部为南流江冲积平原。岭南地区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合浦虽未发现西汉早期的稻类残存物，但西汉中期起合浦开始出现用以储存粮食的陶仓模型，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陶仓普遍流行；部分陶屋中常见人俑持杵舂米、持簸箕簸米状劳作的造型，应是为稻米去壳。西汉晚期堂排 M2 内还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在风门岭 M24B 出土的陶仓中都残存有风化的稻米，可见较完整的稻壳，无法判别属粳稻或籼稻品种。这反映出西汉早期合浦地区粮食储存的客观性。另外，九只岭 M6A 出土的 1 件提筒盖面上有隶书“清米万石”，风门岭 M10 出土的 2 件提筒盖上分别书有“小豆□□”和“□米千石”。可见，当时储存的粮食除稻米外，还有小豆。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生产工具，文昌塔一期墓葬出土铁锛 2 件、铜斧 2 件。锛是汉代使用最普遍的农具之一，可用来翻土、理埂、挖掘等，可见南越国时期铁农具已运用于合浦地区农业耕种。

除农业外，由于有着天然优良的自然条件，合浦地区近海且境内有包括南流江在内的大小河流，捕获各类水产品、海产品较为容易，以此为食物应很自然。1988 年合浦环城乡母猪岭 M1 出土的陶罐和九只岭 M6A 出土的四系罐中有鲍科贝壳，九只岭 M6B 也出土了蚌壳。此外，风门岭 M26 出土的铜鼎内残留有鱼骨，经鉴定有两类，其一为鲷科的鱼，其二为鲷鱼。合浦草鞋村汉城址还出土 20 余件网坠，是当时渔业活动的实物证明。推测早些的南越国时期，这类蚌、贝类和鱼等各类水产品、海产品也是汉代合浦居民的食物之一。南方气候温暖多雨，盛产水果，亦可作副食，如合浦堂排 M2B 出土的铜锅内有荔枝遗存，合浦堂排 M2A 出土的小铜盒内有杨梅遗存。

### （二）采珠业

合浦本地越人在西汉早期已有采珠业，《异物志》记载，“乌浒、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sup>[18]</sup>，乌浒、南蛮为汉代史籍对越族的称谓。汉代合浦采珠业如同盐铁等为官营行为，由政府控制市场，由于采珠业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民间贩卖。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41 年）颁布一份诏书，“吏发



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sup>[19]</sup>。《异物志》中也有记载，禁止民私自采珠，“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叫入水。官禁民采珠”<sup>[20]</sup>。两广地区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仅南越王墓头箱漆盒内出土有珍珠，未经加工；墓主头套下为丝囊珍珠枕。推测这些珍珠可能为南珠<sup>[21]</sup>，不排除为合浦地区向南越王进贡或通过合浦从海外输入的可能。

### （三）手工业

从合浦出土的陶器和铜器看，南越国时期合浦居民已具备较为成熟的陶器和铜器制作技术。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出土陶器 220 件，占随葬品的 80%，属岭南地区硬陶系统。主要为带浓厚地方色彩的日用生活用具。陶质以灰白胎硬陶为主，亦有少量红色和淡红色薄胎软陶。生活用具类器物制作考究，多施釉，纹饰以拍印纹和刻划纹为主，有方格纹、方格纹十曲线形、方形、圆形戳印纹以及篦点纹、细布纹、栉齿纹、弦纹和柿蒂纹等。瓮、罐等体型稍大的圆形器皆泥条盘筑，慢轮拍打，器底后加，其钮、耳等附件多另外模制或捏塑成形后贴上。与中原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相比，合浦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多为小型日常生活用具和少量兵器，器型较小，胎较薄，应为本地制作。

至于两汉早期合浦本地有没有铁器手工业，黄展岳通过梳理南越国出土的各类铁器形制指出，“南越国没有自己的冶铁业，所需铁器要依靠中原供应”<sup>[22]</sup>。白云翔也指出岭南地区的铁器如凹口锛、条形镞、中长剑等器物，从形制来看，“显然是直接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传入的”<sup>[23]</sup>。合浦文昌塔一期的 64 座墓葬共出土铁器 8 件，可辨器型有剑、锛、刮刀和带钩，其形制同广州汉墓及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近。林永昌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汉代岭南墓葬铁器随葬比例总体上有西高东低的趋势，越城岭—灵渠—漓水—西江路线可能是最主要的传输运送路线，铁器的供应更受运输、军事、经济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sup>[24]</sup>。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尚欠发达，且距这条运输路线较远，故出土的铁器数量甚少。

另外，从出土的纺轮可知，西汉早期合浦纺织技术已有一定的发展。合浦仅于西汉晚期风门岭 M26 出土麻布，暂未发现早期丝织品的痕迹，但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同期周边中心地区的纺织技术已相当成熟。如南越王墓残存的炭化织物中，经鉴定有麻布，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用麻布作衬里，还用麻袋来包裹随葬器物。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较多丝织品，品种丰富，原匹织物多层叠放，厚 20~30 厘米。部分铜器、玉石器、铁器等用丝绢包裹；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现一批木质纺织工具，有翘刀、纬刀、卷经板、吊杆、绕线棍等，墓葬出土的“从器志”记载该墓随葬有大量丝织品。

## 三、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线路

吕思勉认为，“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

必先于政府”<sup>[25]</sup>。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已经开展的海外贸易活动是《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合浦为汉代海外贸易始发港口的历史基础。关于南越国的海上贸易和交通路线，《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sup>[26]</sup>和《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sup>[27]</sup>两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 （一）南越国的海上贸易

南海的一些特产在西汉早期以前就早已为内地所认知。比如战国末期《荀子》的《王制篇》中记载，“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成书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人间训》亦提及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而发兵攻打南越。《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南越国时期，长安与南海诸国并没有建立直接的交往，南海物产多是通过番禺等地汇集再辗转运至京师。自合浦沿南流江，过鬼门关，再溯北流江而上，至桂江、漓江，过灵渠入潇水、湘江，最终可至中原地区。

“羽翮”，为鸟的羽毛。《异物志》载：“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sup>[28]</sup>，南越王赵佗曾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sup>[29]</sup>。《续汉书》曰：“西南夷滇池出孔雀”，“西域条支国出孔雀”，“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皆有之。”<sup>[30]</sup>可见西南滇池、海外条支、以及今海南岛的朱崖及越南北部的交趾一带，均盛产孔雀。

“齿”“象齿”，当指象牙。“犀”即犀牛，“革”“犀角”，当为犀牛皮和角。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sup>[31]</sup>。长安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sup>[32]</sup>。犀、象在两汉交州多有出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sup>[33]</sup>。南越王墓出土有犀角形玉杯，组玉佩中有犀形璜；两耳室出土整堆的象牙，经形态对比和现生非洲象较为接近，还有象牙卮、印章、算筹、棋子、饰物等。犀、象也产自东南亚和南亚，《汉书·地理志》有位于今印度东南的黄支国贡献生犀牛的记载，1975年西安薄太后（崩于公元前155年）南陵丛葬坑出土的犀牛骨骼，经鉴定为爪哇岛的独角犀<sup>[34]</sup>。

“珠玕”和“玳瑁”是产自海中的珠宝。“珠玕”即明玕，为合浦所产，是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sup>[35]</sup>。西汉早、中期合浦当地采珠业兴起，汉王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欲求，还须通过海外贸易输入才获得满足。西方珍珠巨大明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珠至围二寸以下”，按汉尺折算，周长二寸的珍珠直径接近1.5厘米<sup>[36]</sup>。西汉早期的南越王墓头箱漆盒内出土有珍珠，墓主头套下为丝囊珍珠枕<sup>[37]</sup>，最大的直径达1.1

厘米，从海外辗转输入的可能性较大。玳瑁也生在海洋深处，背甲黑白斑文、相错而成，可以用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

至于“果布”，应为龙脑香。汉时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已辗转输入中国。两广地区汉墓多出土陶制和铜制熏炉。按当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情况，南越国的香料来自东南亚各地，应无太多歧义，而熏炉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香料在当地已较为普遍使用。孙机亦认为，汉代南方的熏香习俗较北方为盛，中原地区熏炉的出现也相对晚一些，反映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南海输入我国的<sup>[38]</sup>。

此外，与南越海上贸易有关的考古发现还有银盒、金花泡、玻璃珠、琥珀珠、乳香等。如南越王墓主人棺椁足箱出土的银盒，其造型和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使用捶揲法压印出凸瓣纹，此种技艺在中东地区广为流行。据孙机先生研究，这种金属器加工的捶揲技法在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时兴盛起来的。在国内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墓葬中也出土有少量银盒<sup>[39]</sup>。在南越王墓主人上胸发现的珠襦饰物中，有32枚焊珠金花泡制作工艺精湛，泡面用金丝焊接出圆形、心形、瓣索形等多种立体图案，这类焊珠工艺在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就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和波斯等地，后流传至印度<sup>[40]</sup>。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十二面金珠亦是采用此种工艺。

近年来，广州、合浦、贵港、梧州等地汉墓均发现和海上贸易相关的文物，这反映出自南越国时期至东汉晚期，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发展。

## （二）海上交通线路

上述域外物产，多产自南海诸国和南亚一带，其传入路线，无疑多是通过海路，如《汉书·地理志》中把“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

古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南洋航路上，“习于水斗，便于行舟”的越人，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由来已久，至晚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sup>[41]</sup>，而且“不晚于铁器时代起，南中国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跨区域商贸区之一”<sup>[42]</sup>。土墩墓等考古资料表明，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和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sup>[43]</sup>。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已较为成熟，1975年发掘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证实秦汉之际番禺（今广州）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由船台现存宽度推算，1号、2号船台分别可以建造体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大型木船。这种平底船，吃水较浅，适合于内河和沿海岸航行<sup>[44]</sup>。据东汉刘熙《释名·释



船》记载，两汉时船体结构除船的甲板、上层建筑“飞庐”外，还有桅、舵桨、橹、篙、帆、纤绳等，这些船舶设备从岭南地区出土的木船、陶船等模型亦可看到。造船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帆的使用，使利用季风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从南越墓出土的有关海外实物资料的原产地来看，这条南海交通航线很可能在南越国时就已经开辟了<sup>[45]</sup>。而南越国苑遗址发现的具有海外文化因素的八角形石柱也表明，这一时期南越地区与印度已有交流，“两地从最初的动物、植物、矿物制品的贸易交换，发展到技术、艺术的传播”<sup>[46]</sup>。正是到了南越国时期，越人对海洋的不断探索，累积丰富的海上交通经验，对双方物产和文化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汉武帝平南越前，也已经注意到番禺对外贸易的存在，故在平定南越后，即派使团沿着民间开辟的航路，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如果没有南越国奠定的基础，不可能出现“武帝以来”的南海交通盛况<sup>[47]</sup>。

汉代的造船技术虽有发展，但船只相对较小，难以抵御远洋航行遇到的巨大风浪，故一般是沿岸航行，方便停靠补给。因此在三国时期开辟跨海离岸的航线之前，从番禺出发，北部湾畔的合浦是海路必经之地。不过，之前合浦发现的南越同时期墓葬等级较低、规模较小，与海外交流直接相关的文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

[1]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第1669页。

[2]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中华书局，1965，第225页。

[3]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灵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5，第340页。

[4] 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载《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一）》，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2，第1-79页；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51页。

[5]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63-272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57-458页。

[7]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63-272页。

[8] 富霞：《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9] [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8页。

[10] [汉]郑玄注《礼记·王制篇》卷第四，第14页。

[11] [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卷一，明嘉靖九年（1530年）刻本，第7页。

[12]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13] [唐]刘恂：《岭表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89页。

[14] [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二，中华书局，1979，第41页。

[15]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六章《百越系（汉族来源之四）》，载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中）》，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第 47-49 页。

[16] 吴绵吉:《百越文化简论》, 载《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07, 第 40-49 页。

[17]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下, 中华书局, 1962, 第 73 页。

[18] [汉]杨孚:《异物志》, 中华书局, 1985, 第 2 页。

[19] [汉]班固:《汉书·景帝纪》卷五, 中华书局, 1962, 第 153 页。

[20] [汉]杨孚:《异物志》, 中华书局, 1985, 第 3 页。

[2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218 页。

[22] 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 《考古》1996 年第 3 期。

[23]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315 页。

[24] 林永昌、张强禄、陈建立:《汉代岭南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以墓葬随葬铁器的空间分析为视角》, 《南方文物》2019 年第 3 期。

[25]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 译林出版社, 2016, 第 488 页。

[26]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第 37-42 页。

[27]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第 67-129 页。

[28] [汉]杨孚:《异物志》, 中华书局, 1985, 第 5 页。

[29] [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卷九十五, 中华书局, 1962, 第 3852 页。

[30]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二四, 中华书局, 1960, 第 4103-4104 页。

[31]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 中华书局, 1962, 第 176 页。

[32] [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一一七, 中华书局, 1959, 第 3025 页。

[3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九〇, 中华书局, 1960, 第 3955 页。

[34] 王学理:《汉南陵丛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头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 《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 《文物丛谈》,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285-286 页。

[35] 王元林:《秦汉时期番禺等岭南港口与内地、海上交通的关系》, 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2007 年年会论文集》, 三秦出版社, 2008, 第 151-174 页。

[36]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18, 第 81 页。

[3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218 页。

[3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358 页。

[39]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第 67-73 页。

[40]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第 96-97 页。

[41]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 《考古学报》1988 年第 1 期。

[42] Hsiao-chun Hung, Kim Dung Nguyen, Peter Bellwood, "Coastal connectivity: long-term trading network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8, no. 3 (2013): 384-404. 文中提到的铁器时代始自公元前 500 年的沙蜃文化。

[43]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 《考古》2016 年第 8 期。

[44]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 75 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文物》1977 年第 4 期。

[4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347 页。

[46] 全洪、李灶新:《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的海外文化因素考察》, 《文物》2019 年第 10 期。

[47]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第 42 页。